

大灾后反思 反思后大千

江苏省省长 陈焕友

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我省遭受了巨大损失，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大灾后反思、反思后大千”，这一任务已历史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

今年我省的洪涝灾害，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整个梅雨期间，太湖地区和江淮之间雨量高达700—1300毫米，比常年梅雨量多3—6倍，超过1881年有记录以来的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的1921、1931、1954年的梅雨量。全省11个市、64个县(市)全面受灾，不少地区重复受灾，持续受灾，严重的灾害一度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使经济运行发生困难。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到了重大损失。

大灾发生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田纪云副总理先后亲临江苏视察、指导，送来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全省上下进行了紧急动员和部署，把抗洪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组织了几百万人的抗洪抢险大军，与特大洪涝灾害进行顽强搏斗。各级领导战斗在第一线，加强指挥调度，根据汛情发展，作出正确决策。广大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临危不惧，英勇奋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勇挑重担，哪里有险情，哪里最艰苦，就战斗在哪里。各部门打破常规，急事急办，立足本职搞好服务。在抗洪救灾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现在，我省抗灾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全省江、河、湖、库没有出大的问题，保证了铁路大动脉和机车的畅通，公路干线基本畅通，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基本正常，“三资”企业、旅游设施等未受多大影响，群众情绪比较稳定，社会比较安定。抗洪救灾的斗争实践，再次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表现了具有光荣传统的江苏儿女的顽强意志和崇高精神。

(二)

这次特大洪涝灾害，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应当肯定，40多年来我省在国家支持下，充分发挥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初步建成了防洪、防潮、

防洪、防旱、防渍的水利工程系统。在今年遭到特大暴雨袭击、江河并流、洪涝夹击的严峻形势下，近5000多公里的江海河堤防经受住了一决口，1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无一垮坝，300多座大型水闸无一失事，并有效地发挥了调蓄功能，减轻了灾害的损失。如果没有过去的水利基础，没有10年改革开放增强了的集体经济实力，灾情会更加严重，后果不堪设想。1931年的洪水比今年小，但那年仅兴化县就死了21万人，高邮县也死7万多人，整个经济陷于瘫痪。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江苏现有水利工程的抗灾能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很不适应。这次造成的重大损失，一方面是遇到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人无回天之方，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在水利建设以及工作上存在上的问题。水利设施防洪标准普遍偏低，特别是一些流域性骨干工程防洪能力严重不足。太湖地区规划的排洪通道未完全实施，洪水出路受阻，加之湖区有些地方盲目围垦，湖河调蓄能力严重下降，使苏、锡、常“金三角”损失严重。

最近，我们针对洪涝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反思。必须充分认识到水利建设在国情中的战略地位。这次大灾使我们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命脉，是工业发展和城市生存的前提，是交通发展的重要条件，维护生态稳定的基础因素，因而是必须超前发展的基础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利建设必须紧紧跟上。否则，经济发展越快，遇上大灾，损失就越大。

必须有稳定的水利投入。水利建设，一定要不断增加投入。这些年来，虽然在各级财政拮据的情况下，靠省和地方的共同努力，靠群众的劳动积累，挖了不少土方，搞了一些续建工程，对前几十年搞的大量工程，进行了一些维护。但由于投入不足，原来规划的许多骨干治理项目无力上马，对不少老化和陈旧设备，也不能及时更新改造，遇上今年特大洪涝，现有防洪抗洪

设施则无力阻挡。今后要把水利建设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倾斜政策，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不断增加投入，分级负担，建立国家、地方、群众多方投入的稳定机制。

必须正确处理资源开发和行、蓄洪的关系。前些年，有的地方违反自然规律，与水争田，在行洪道、出水口、湖湾滩地等，盲目围垦造田，从一时、一地、一个局部来看，对经济发展可能有好处，但是破坏了水系，破坏了生态平衡，降低了蓄洪区的调蓄能力，在全局上是得不偿失，在局部也是祸患无穷。应当说，在保证行洪的前提下，合理、科学地开发一些滩涂、水面是可以的。但任何事情超过了“度”，好事就可能变为坏事。

必须加强城镇防洪设施建设。城镇防洪排涝设施是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灾害损失，城镇和行业方面占了一半，又大都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锡常地区。除了流域治理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城镇防洪意识不强，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相比较而言，重视防洪，不重视排洪；重视农村，不重视城市。洪水无情，平时对防洪建设不重视，一旦洪水袭来，势必付出高代价。还有一些城镇不按《水法》办事，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严重下沉，也是五六十年代搞的，在人口膨胀的情况下又不注意污水和垃圾的处理，长期积累成灾，洪水一来更是排泄无路。城市防洪，关系大局，科学合理地规定城市防洪标准和排涝能力，才能做到有备无患，有御则安。

(三)

这次特大洪涝灾害，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必须贯穿“大灾后反思，反思后大千”的精神，抓住机遇，努力工作，大千、大千，掀起水利建设热潮，抓紧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以重振江苏经济雄风。

大连机车车辆工厂为铁路运输做贡献 2000台东风4型内燃机车奔驰四方

本报大连9月27日电 今天下午3时，东风4B1960号内燃机车一声长鸣，驶出大连机车车辆工厂，第2000台东风4型内燃机车投入了中国铁路运输线。

到目前为止，这种机车已编及全国11个铁路局56个机务段，它的产量已达到全国内燃机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仅作为替代进口机车一项，已为国家节省外汇72亿美元。

大连机车车辆工厂是我国最大的铁路内燃机车生产基地。1974年，该厂开始批量生产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功率东风4型内燃机车。

1987年，东风4B型机车一举摘取我国内燃机车的第一个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国优产品产值已占工厂全部产值的93%。去年，这个厂又荣获国家质量管理奖。

“生产一代，试制一代，研究一代”的新产品开发战略，使产品升级换代步伐由过去10年一代，发展到今年开发4.6吨机车的速度，并以东风4型机车为基础，开发出东风5型调车机车、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东风6型内燃机车等系列产品。

(王清宪 程红光)

我国第一家铜交易所成立

水利部表彰“老水利”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费伟伦报道：我国第一家生产资料交易所——金鹏铜交易所今日在京正式开业。

金鹏铜交易所由向有色冶金工业总公司主办，面向全国经营，经营范围为计划外电解铜及铜材期货交易、远期合约、期货及现货交易，将按国际惯例操作。目前以现货为主，以远期合约为辅，逐步向期货、期权交易过渡。交易所共有28家会员单位。

今天的首次交易活动，共成交电解铜245吨，成交金额达4100万元。



水利部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职工荣誉证书颁发大会。

建国以来，水利战线130多万职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艰苦创业，勤劳奋斗，在治理江河、兴修水利、防汛抗旱、水土保持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水利事业的振兴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表彰他们的业绩，水利部向16万在水利战线基层工作25年以上和县以上水利部门工作30年以上老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和证章。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设立了“世界名品城”商场，主要销售世界著名的男女系列服装、童装，品种达2000多个，深受消费者欢迎，每天接待顾客10万人次。(左图)此外，百货里开设了整改室，顾客看购买的衣服不合体，可在这里免费修改。(上图) 本报记者 沈进

木板床与席梦思

彭广荣

年纪大了，睡“席梦思”总觉得不舒服，想换木板床。本想这是件容易事，到家具商场去买呗。可没想到，并不那么简单。县城的几个家具门市部都没有，而且营业员几乎都这么说：什么年代了，还用木板床？我只好托车司机到本市、县代购，结果也没买到。没办法，只好到木材公司买木料，请木匠定做。

这勾起我一联想：货真价实的商品，追的是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它既包括时髦的新产品，也包括实用的木板床也许日子更好过些罢。

沧州炼油厂向管理要效益

本报讯 沧州炼油厂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截至8月底，完成利税比去年同期增长23.12%，提前4个月完成全年利税计划。

今年以来，这个厂严肃处理了20多起违纪事件，使全厂职工的纪律性进一步加强。同时，在职工中开展技术练兵活动。全厂先后有40多个单位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技术比武，参加职工达2500人，占职工总数的80%。据统计，技术练兵活动开展后，全厂避免了十几起事故，实现了安全优质生产，各套生产装置的产品、质量、品种、能耗等多项经济技术指标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两套催化装置日产量突破1200吨，综合商品率比去年提高0.6%，催化剂单耗降到1000克/吨以下。(高中南 吕波)

珠富士建筑设计工程公司在京开业

本报讯 由中日合资的珠富士建筑设计工程公司和日本国株式会社白石合资经营的珠富士建筑设计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日前在北京正式开业。该公司承接国内外土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管理、技术咨询服务等业务。

自动电话报警系统投放市场

本报讯 北京前门地区生产的“自动电话报警系统”已通过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的技术鉴定，并投入市场。该系统通过公共电话网，将报警信号直接传送到消防队，缩短了报警时间，提高了灭火效率。该系统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家庭，每套设备投资约1000元。(董峰 北京)

济南洗衣厂在京让利销售

本报讯 济南洗衣厂近日在京举办“让利销售”活动。小天鹅、圣吉奥洗衣机是厂内主打产品，让利幅度达10%。该厂生产的洗衣机，质量可靠，售后服务周到，深受消费者欢迎。此次让利销售，旨在扩大市场占有率，回馈广大消费者。(董峰 北京)

全国严控办强调 从严控集团消费

这是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负责人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控制集团购买力会议上提出的要求。

目前，社会集团非生产性消费增长势头较猛。1—6月全国社会集团非生产性消费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20.6%，其中专项控制商品支出增长达51.3%，大大超过了生产、社会商品零售和居民消费增长的幅度。

会议强调：一、要把做好控购工作和支持抗灾救灾结合起来。对直接用于抗灾救灾的社会集团购买力支出和专控商品购置给予积极的支持；二、要把做好控购工作和促进企业增收节支和提高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对企业集团预算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以及经济效益下降、亏损增加、欠交税利的企业购买专控商品要从严审批或不予审批。三、要把做好控购工作和促进产品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四、把做好控购工作和加强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结合起来。

(孔 璇)

金秋，来自皖、鲁、豫、苏、浙、沪6省市的政府负责人聚首北京，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领导一起，共同治理淮河、太湖大计。

水利部长杨振恒在会上宣布，“八五”期间，中央和地方将投入9.4亿元，在淮河、太湖流域兴建28个大型工程。治理后，淮河将加大堤防加固防洪灾害能力，太湖则将成为能排、能引、能灌、能供水和通航的综合利用的宝湖。

这是继50年代治淮以后又一次大的动作，也是一项宏大、艰巨的工程。

梦寐以求 国务院治理淮河、太湖会议侧记

谈到对国务院决定再次大规模治理淮河、太湖的想法，到会的省长、市长都说是文明之举。

安徽省今年洪涝灾害损失惨重，仅淮河流域的损失就超过150亿元。省长傅锡铸说，淮河水是安徽的心腹之患。前40年治淮，成绩很大，然而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安徽，地处淮中游，薄弱部位多，仍然灾害频繁。这次国务院决定全面治淮，并把安徽省列为整治重点，机会难得。我们安徽人民将从大灾中振作起来，克服困难，全力以赴抓紧治淮。

浙江省副省长许行贯把太湖流域喻作“鱼米之乡”、“丝绸之乡”、“文武之乡”、“旅游天堂”。他说，这一切靠太湖哺育。可是，由于长期未能全面治理太湖，这次吃了大亏，教训深刻。教训之一，就是忽视了治水规律，重堵轻疏。这次会议决定先打开三条通道，让太湖顺利入江入海，令人振奋。他说，浙江将配合治理太湖工程治理，由他任总指挥，令冬就干。

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带来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意见：坚决按国务院的决策办，认真发动机关干部、发动群众，在全国重视水利建设的大气候下，形成自己的小气候。

大灾之后，各省市已对加快治理淮河、太湖形成共识，对水的忧患意识增强，加快治理淮河、太湖步伐的心迫切迫。

共担重任

各省市决心很大，困难也不少。会议讨论最多的问题，是资金的筹集和分配。9.4亿元计划投资中，除中央投入61亿元外，其余部分要由地方配套筹集。

安徽的困难不必说，连公认为“财大气粗”的江苏也吃力。江苏省副省长蒋以谔说，省全年财政收支计划为144亿元，由于水灾，1989年才收入55亿元。

尽管如此，各省市都表示要另辟渠道配足资金。

国务院治理淮河、太湖会议侧记

新华社记者 张传宣

赵鹏

本报记者 蒋亚平

与会代表谈到了过去40年中治理淮河、太湖的经验、教训。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袁国林特别强调，由于地理、气候、历史等复杂因素，一定要充分认识治理淮河的艰巨性，要准备打苦仗、持久仗，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任重道远

安徽省副省长汪涉沙总结说，关键的问题是要科学周密的规划，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有一种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作风，同时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投入，切不可“热一阵，冷一阵”。

实际上，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各项主体工程，早已有规划。久未能动工或是未完工的主要原因，除投入不足外，各地利益难以协调也是一重要原因。这次会议把八个大字突出起来——治理、团结治水。要遵循客观规律，按流域科学规划、管理、调度，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上下游、左右岸、各地方齐心协力，是搞好治理的保障。坚持治水为中心，全力搞好综合治理，综合利用，是关系两流域工程措施能否真正发挥效益的关键。

与会代表认为，治理淮河、太湖是一项造福后代、恩泽子孙的伟大事业，是我们这代人肩负的历史责任，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完成进一步治理淮河、太湖的伟大使命。

赣州战役是在1932年1月,红军进行的一个重要战役。我当时是红军团政训委员。弹指一挥,转眼60年已经过去。今天,回忆起来,感到很有政治、军事和历史意义。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使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国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抗日反蒋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发生危机。

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胜利后,取得了很大发展。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展到20多个县,占有15座县城,形成了一个拥有200万人口、连成一片的、较巩固的苏区。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1.7万多人,在我党被迫切迫下组织30多个党的特别党支部领导下,在参谋长杨干才、旅长董振堂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南部的“剿共”前线起义,宣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从而使红军增添了一支新的有生力量。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增加到近7万人,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

那时,全国抗战即发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的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促进革命的进程。然而由于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不能够及时作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方针和主张。后来在共产党内错误的下,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出来,但在实际上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缺乏有力的措施。当时的党中央一方面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卖国主义、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指导了各地特别是东北、华北和京沪等地的抗日反蒋运动。但在党内贯彻执行过程中,又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出发,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否认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继续实行一系列“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并夸大国内革命发展的可能性,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一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口号,以致丧失和耽误了利用大好形势推动革命的良好时机。早在1931年1月,在上海,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就在党中央内提出得到了领导权,并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闻天为副主席。毛泽东被免除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红军建设。中央军委会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后由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任总经理部。我在福建上杭县安作协任中委的职务,到汀州医院治疗。我在那儿见到了毛泽东。毛主席很关心我的伤势,来看望我,并送来了牛肉汤给我补身体。我伤好转后去见了毛主席。他当时正在为路线斗争作准备,正在看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很有价值的理论著作。毛泽东出院后,被迫到了农村做调查研究。《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以后,毛泽东所填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围剿”时期所填词意境迥异。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景这边独好”等词句,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

临时中央的重要成员由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苏区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出版发行的中央机关报《斗争周刊》、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等,集中发表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只是由于共产党国际的干预,批判文集中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批判毛泽东的帖子,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所谓“罗明路线”和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劣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打出去”,土地政策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维护苏维埃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等等。

1931年9月20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反革命危机逐渐形成而发生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以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要

忆红军赣州战役——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

方强

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这个决议不仅在政治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而且在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等冒险主张。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又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当前的任务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并指示中央红军(原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

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不赞成打赣州。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在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口号下,集中兵力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方向发展。但未被采纳。红三军团以南昌为中心,但苏区的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1931年12月中旬,我由红军第三团第五军第一师第二团重机枪连政治委员调任为红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团长是曾普霖,政治处总支书记是周德顺,后是汤平;俱乐部主任段友文;青年干事李由,技术书记赵炳南。当时我们二团正进驻在会昌筠门岭,进行第三次“围剿”胜利后的休整,加紧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待命行动。

1932年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出了《夺取赣南的军事训令》,指出坚决夺取赣州贯通赣南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的苏区广大版图。于是红军被迫攻打赣州。红三军团以南昌发出,经于都到达赣县下湖桥村,架设浮桥,渡过信丰江。2月上旬,各攻城部队分别到达赣州城外,从而揭开了赣州战役的序幕。

(二)

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是连接赣粤两省的要道,位于赣江上游,东连东北三面环水。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向西流,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只有南面是陆地,地势十分险要,是历代兵争必争之地。城墙高7米,城垣坚固,碉堡林立,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我们部队进到赣州城外后,红一师师长侯开中、师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张翼、政治部主任黄善斋(江华)侯开了作战会议,通报了国民党有关军事行动和赣州城的情况,布置了我军各部的作战任务和部署,并且通报了我军进驻围城情况。红军攻城部队各项进攻准备就绪后,总指挥邵首次发出了解攻命令。战斗于2月13日打响。当时,红一师配合红二师在赣南西南城角发起爬城战。在炮火机枪火力掩护下,红军战士以个人为一组架设云梯爬城,向守城敌军发起猛攻。守城敌军除用各种火力射伤爬城红军外,还向攻城红军投掷大量手榴弹、土炸药。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爬城攻城,英勇拼搏,前仆后继,但均被守敌火力所阻。

在爬城前,各部队爆破队在指定地点挖战壕,全靠手工作业。战壕挖了一米多宽,战壕内还有水,条件十分艰苦。敌人发现红军挖战壕,疯狂地向战壕口扫射,战壕内冒着弹雨,在狭窄的作业面上,三一班昼夜轮番作业。终于在西南、东城墙被炮伸展到城下。筑战壕作业过程中,军团部组织了各部队互相参观学习,推广先进经验。彭德怀总指挥像往常作业一样亲临前线,侦察地形、指挥部队作战,到各战壕检查指导。

在爬城强攻不下的情况下,决定爆破攻城。用木棺材装上600多斤石硝、木炭、生铁块,加以密封,用手榴弹进行引爆。2月23日,红军攻城部队从赣城东门、南门、东门发动了连续三次爆破攻城。上午9时,我主攻东门的红一师首先发起爆破攻城。当爆破队炸开西门月城角城墙后,红一师冲锋队由师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手持机关枪、驳壳枪冲进城,向城内冲锋,我主力跟上,在月城角向敌冲锋。几次冲锋,但因遭到主攻工事的敌人猛烈炮火火力所阻被退撤回。接着在11时左右,红二师的二师师攻了南门外城墙的一角,但由于城墙外壕,造成了红军伤亡大量。同时,南门守敌在月城角靠城左右坚固工事抵抗,我后续部队也未能见入。与此同时,主攻东门的红二军,炸毁了东门月城,红军战士乘势稍稍爬进,在机枪掩护下,在三百米宽的突破口上向城内冲锋,有四五十人翻过城墙,占领了攻城楼,对敌威助很大。正值此时,马昆到此督战,现地指挥。他发现士兵向后退却强令制止,并指挥随从卫队协同守部队用密集火力封锁城墙缺口,以阻止红军后续部队,另又调集部队抢救城墙。红军后续部队曾几次发起冲锋,终因敌人火力猛烈而受挫。突入城内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经过四次激战,红军攻城部队不得不一次次撤下城楼。

当晚,彭德怀、滕代远电告中革军委,指出“攻城希望很小”。实质是抗议攻城,要求撤围。此外,一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在赣州战役开始之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行为持反对态度;部队撤赣州城下,发现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感到这个仗打不得。他在第一次进攻受挫后和第二次攻城后,曾两次提出撤军建议。但都未获批准。

3月1日,中革军委指挥机关到前方赣州城郊。强令红军再攻赣州。发布了《中革军委关于坚决夺取赣州剿匪消灭来援敌的训令》。重新调整部署,增调了从湘南地区整训的红军军团装备。3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印发了《告红军战士书》。号召红军战士在最大决心进行持久战,拿下赣州。

根据指示,各部队作战了赣州战士昼夜加紧施工,终于在军委发出《训令》后的第二天攻进了东门、南门、西门的爆破战壕。这次爆破的重点在东门。红七军在东门安装了三个大炸药棺材,

按计划于3月4日进行了第四次攻城,炸开了东门城墙及左右两侧城墙20多米,炸死敌官兵李自林等200多人,为攻城部队创造了条件。红七军五十五团在团长卢绍武、政委陈漫远指挥下,即发起猛烈冲锋,政敌寇连长带领第五连冲在最前头。但是,由于爆破的前两日晚,有两名投诚的马昆的部下又反水过去告密,马昆得知红军又将攻城的消息后,连夜进行新的观战部署,不顾老病虚弱苦累反对,不置人民死活,将东门铁匠街的房屋全部炸毁,强令居民每户送一个沙包,当夜就在东门内构筑了第二道新的防御工事。并将防守兵力由一个营增加到一个团。当红七军破城冲入月城后,敌军以第二道防卫工事为屏障,以强大的火力网进行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一度攻上城墙,我连续四次冲锋,与敌激战近4小时,我伤亡较大不得不撤出战斗。同日,主攻西门的红一师和主攻南门的红二师均因坑道积水,几次引爆炸城未能成功。上述三次攻城战斗中,我伤亡很大。红军在战斗中打死了许多许多无名英雄。第二次炸城时,二师的200多人的突击队,由二团团长叶长庚指挥,在南门城下全部英勇牺牲。

红军围攻赣州战斗打响后,赣州敌军旅长马昆一面死守顽抗,一面电告国民党南昌行营向蒋介石求援,将剿命令其主力陈诚派兵援赣。陈诚调遣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和两个独立旅三万余人;统归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指挥,从吉安出发。经赣州增援赣州。2月27日,该敌进至赣州西北30余公里之沙地、横石村一带,28日遭到我独立一师阻击,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敌十师师于29日占领赣州西北章水以北之赤岭地区。十一师占领赣州西面、章水以西之杨源渡南桥地区。并在赣州北门外架设浮桥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由于沿江上下游部队被红军主力封锁,无法渡江。后来知道马昆曾冒生命危险逃,由北门用绳索吊出城外,偷渡浮桥与罗卓英会面。密商了“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攻,以解围困”的部署。罗卓英连夜派了一个工兵营随马昆进城,加固浮桥挖出坑道,企图过河进剿。

在此之前,红一师率团冲锋,减少数兵力,驾驶四只“火船”向浮桥敌军发起数次攻击,均受敌军重机枪猛烈火力扫射,我驾船战士纷纷落水,未能奏效。随后,又组织炸桥队,把棉花包堆在木排上,点燃汽油,燃起烈火,推向浮桥炸桥,中途又逆风所阻,棉花桥烧出来未能实现。

3月5日夜,我团团长曾春霖在前沿章水工事内,用望远镜看到敌人偷渡浮桥,即指挥全团机枪扫射,打得敌人不得不匍伏和停渡,但停止片刻后,敌又继续渡桥。后来知道这是故援军前敌指挥邵英(第十一师第三旅旅长),率一个团进攻赣州浮桥。次日晚,罗卓英亲自率一个团和师指挥机关渡桥。敌人经过两天多次发动了城内出击战。3月6日敌人下达出击命令。7日凌晨一时敌人分三路向我军进行反击。两路从城内反击,一路沿江边向红军左翼进攻。红军罗卓英3旅66团6连两个由西南之江门坑道出击,向天竺山到白云山一线的红军阵地反击。马昆68团由东门坑道出击,以天竺山为目标向红军阵地,同3旅两个团会合,形成对红军另一主攻的主力沿章水向红三军团左翼进攻了推进,造成十师内外夹攻的态势。

由于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战士过度疲劳。敌人乘机偷袭了我红一师师,敌又调集机关遭受损失,打乱了全师的指挥系统,但各部队战士迅速组织火力守阵地进行战斗。我团团长曾春霖率第二团和红一师、二师及红七军一起,与敌在交通沟的炮火,向在江机场上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师政委黄克诚带一个通讯班逐步来到我团阵地,命令我团撤退。我即令第六连政委马贵虎(当时当连长)坚守阵地掩护部队边打边撤。黄克诚政委惋惜地说你们团连连进攻有些惊慌失措教训了他一顿:“你慌什么?你们团官兵还不在前线吗?”我在边打边撤中,撤至团门外又与从章水渡河回包抄过来的敌军遭遇。敌军凭借兵多和武器优势,向我红一师和红二师及红七军突围指战员疯狂扫射。红军战士与敌人三路展开了激战,在混战血战中,红军打垮了十架英勇顽强,有的部队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有的红军战士持着手榴弹愤怒地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现时观察委江华、王、委员刘志坚,国防大学校长张策,前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袁周,炮兵副司令员李达、吴信泉,海军副司令员王平,军事学院院长叶楚傖,济南军区政委方正,副总军需部长于德远,总参三部政委张正光,海军潜艇学院政委吴西等许多同志,他们都是攻城战斗的参加者,是当时部队中的军事、政治指挥员,都是有功之臣。

在这次围困战中,我军指战员虽然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自身伤亡很大。在战斗中我看到师长侯开英曾身负重伤被敌人囚死,正通过我工团阵地大路上的茶亭。部队撤出后,听说师长侯开英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当时,敌军死死咬住我攻城部队不放,我撤敌后,我反击敌后,就这样我们同敌人反复进行了20多次反击战。我在反击中始终掌握着全团部队,未被打乱,但伤亡很重。7月上旬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率警卫连及总预备队红五军团第十三赶到增援我军。当日下午二时,红五军团十三军进入阵地投入战斗,在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在发扬各种轻重武器杀敌的同时,充分发挥了红五军团的特长,全军赤膊上阵,手持在太阳下发亮反光的马刀冲向前进,勇猛杀敌前进,这样击溃了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反击,掩护了我攻城部队退出战斗。至此,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宣告结束。这是一场苦战、血战,红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一师被敌分割损失八九百人,师长侯开英和战士400多人被俘。但另一方面红三军团经过这场苦战的锻炼,由于战时政治工作做得好,在战斗中党支部发挥了核心作用,共产党员始终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因此,战斗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更加增强了。部队得到了新发展。但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

红军攻打赣州撤围后,3月8日,红三军团及增援部队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至赣县江口地区整训补充。中央苏区中央局中旬在赣县江口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研究

赣州战役后红军的行动方针。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张纯清、邓萍出席了会议。

赣州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仍然有它的历史意义。红军在攻打赣州期间,发展了信丰、大余、崇义、上犹、遂川等县苏区,使赣南苏区与中央苏区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建立了许多赤色政权、地方党的组织,增添了红军独立第八师,扩大了红军。在这次战役中,红军进行了攻坚战实践,取得了一些攻城经验。特别是红军指战员不畏牺牲、英勇牺牲的事迹和精神,永垂不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赣州战役,也有极深刻的教训:

一、对当时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表现为,在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对全国敌强我弱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客观事实缺乏认识,既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危机,又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因此,对当时苏维埃革命的任务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夺取中心城市,可以在“最近时期的任务”中,作为我们留下了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目的。这是王明“左”倾冒险路线所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事实,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其次,当时正处在“一·二八”事变后的形势下,应当举起抗日民族革命旗帜,适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卖国阴谋和发动内战的反动实质,使全国人民深刻认识大,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这样对防止内战,巩固并扩大革命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相反,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反而给蒋介石造谣已久“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借口。这也脱离当时政治形势的客观现实的反动。

二、战略战术上方针错误:在敌强我弱,敌小我的军事形势下,战略上必须是持久战,但在战役战术上则相反,必须进行速决战。如果持久战久持不利。在军事方面,战略必须实行以少胜多,如在战役战术上,则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军事指挥上,必须始终贯彻机智灵活的战术战术所确定的目的,逐渐改变我形势,分批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这些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而赣州战役则完全相反。

三、战役战术不妥当(一)一旅情况不明,一方面对当时敌军死守重要城市赣州的决心和重视程度估计不足,没有看到国民党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更加把赣州当作向苏区进行新的反革命军事进攻的“桥头堡”,结果贸然决定进攻。另一方面,对守敌力量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的要大得多。原以为只有8000人,其实是18000人,超过红七军的攻城兵力。特别是估计到敌人如此强大的援兵力,红军以劣势兵力在地形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攻城,致使以劣势兵力与强敌周旋,自然难以攻克。(二)在兵力部署上,对故援军的作战力量估计偏低,只是经过整编的六个连的守,造成敌方援军从吉安出发,沿途快速援军受阻,只是在受到红军两大独立师的攻击,但很快被故援军合围。故援军迅速到赣州,大大加强了对攻城红军的压力。

(三)红军的装备和条件不具备攻打敌人重兵驻守和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红军当时缺乏攻城攻坚的条件和经验。赣州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红军当时有的武器装备,既没有足够的炮火,又无重炮攻城,是难以攻克的。挖战壕筑城无器械测量,单靠手工作业,技术不精,造成主攻东门的红七军攻城时,城墙向外倒塌了,致使埋设在城墙下的冲锋队战士200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四)在攻城打援的指挥上有缺点错误。把负责打援的红四军主力放在南面,用来对粤军援敌,没有估计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的吉安运动援敌;没有及时侦察发现吉安有苏军两个师援赣,部队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未能北面打援援兵,未能防止故援兵偷渡入城,造成对红军进行内外夹攻。

(五)攻城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整。我军攻城久攻不克,攻城部队昼夜坚守阵地,得不到应有的休息。援军到达,又未迅速调整部署迎敌,屯兵敌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乏,在敌军疯狂反扑时,遭毁灭性,伤亡很大。

(六)没有做好对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在红军攻城开始,开展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守城守军。但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提出了“夺取赣州,活捉马昆”,“只杀马昆不杀守城兵”等口号,没有给马昆留下生路,使马昆感到绝望,只有死守顽抗到底。当被我们双方出现相持时,虽然曾由原国民党军派到,当时任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给马昆写信劝降,利用他们过去是同党的关系,劝他“撤城起义”保证他的生命财产。但马昆认为罗在红军中“资历不深、地位、威望不高,不敢相信他能保证我的生命”。所以没有起作用。同时,没有利用自己内部矛盾。陈曾给马昆发电报说:“查赣围已解除,中革军委东下”,实际即打散马。马昆对“撤城起义”电报意图不明,心情异常焦虑。”我们没有利用其矛盾,进行尽可能争取马昆弃暗投明,致使他们在赣州战役中死尸遍地,负隅顽抗到底。

赣州战役虽然已过去60年了,但回顾起来,不仅仍然有许多惨痛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而且当年红军指战员不顾生命,浴血奋战的英勇形象又一再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并激励着我们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华光V型彩色电子出版系统



彩色文图合一编辑
电子加网四色输出
高精度电分机效果

一九九一年国货精品金奖

潍坊计算机公司照排系统部

地址:山东潍坊市东风大街142号 电挂:0308 电话:(0536)235176 236921-235 邮编:261041 传真:(0536)235397

北京办事处
西外大街新亚大厦2号院3号楼2单元101
电话:(01) 8422542
邮编:100044 联系人:蔡福和 张晖
广州办事处
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印厂五楼
电话:(020) 763998-4037
邮编:510600 联系人:李广文
上海办事处
南京路中央商场维修中心·华光系
统技术咨询服务部 邮编:200002
电话:(021) 3296048-235 联系人:成岗
重庆办事处
重庆解放路重庆日报报社
电话:(081) 46911
邮编:630005 联系人:崔振远
南京办事处
新华路27号 邮编:441003
电话:(0710) 222234 联系人:周荣桂

新疆办事处
乌鲁木齐市七道湾路6号工商行干校
电话:(0991) 218680-36 邮编:830093
联系人:樊世军 何晓斌
长沙办事处
西安大路3号市府三所三楼
电话:(0431) 828535 邮编:130051
联系人:邵强 曲显臣
西安办事处
和平门外环城南路东段1号
电话:(029) 710440-348 邮编:710001
联系人:范彬 范彬
武汉办事处
武昌武昌路319号 电话:715900-265
邮编:430007 联系人:李庆春 丰铁流
福州办事处
福州市古厝路11号
电话:552484-招待所 邮编:250003
联系人:王雅明 陈松

